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主 编 王绍曾 罗青

李威周 刘志义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中日文化交流简述

李威周 刘志义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济南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王绍曾 罗 青 主编

李威周 刘志义 著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75印张 90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40

ISBN 7—5328—0461—5/G·373

定价 1.10 元

出版说明

近几年来，国内文化界对编写“中国文化史”引起普遍的重视。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在讨论如何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广泛深入地宣传、介绍我国五千年灿烂的文化，来激发青年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我们这套《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而编写的。

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曾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作为炎黄子孙，无不为此而骄傲。同时，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古老文明，都是我们的祖先长期奋斗、积累的结果；没有斗争，没有创造，就不会有悠久的灿烂文化。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个光辉的传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把我们的聪明才智，无私地献给祖国，为两个文明建设，为人类文明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部中国文化史，涉及到许多专门学科，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这套丛书不可能兼收并蓄，只能就文化史上较为重要、较为突出、并为大家感兴趣的专题，分别作系统的重点的介绍。大体上包括考古文物、科技发明、典章制度、图书典籍、文学艺术、衣食住行、风俗礼制、宗教信仰、中外交

流、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这些领域，曾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和探索，但作为普及文化史知识而编写的成套读物，过去很少有人做过，我们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我们这套丛书的特点是通俗易懂，生动具体，图文并茂，力求做到科学性、通俗性、趣味性相结合。同时尽量反映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以适应各个层次读者的阅读。这套丛书，每册一般六至七万字，将分批陆续出版。

这套丛书在编辑过程中，先后参加工作的还有鲁军、胡延声等同志。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错误，希望在读者的帮助下得到改进。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日

前 言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内容十分丰富。本书从传说的两千多年前徐福率领三千童男女东渡写到1984年三千日本青年来华访问（发稿时又记入了1985年中日两国围棋比赛的盛事）。一衣带水巧连着两次三千青少年的友好往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堪称是世界历史舞台上少有的佳话。这漫长的两千多年，日本从中国吸收了佛教与孔、孟、老、庄、朱熹、王阳明等的思想，还有农耕、制陶、纺织、建筑等多方面的生产技术，学习了中国的文学艺术、书法绘画、医药体育，还有唐以后的律令典章、政经体制，并利用汉字创造了日本的文字……从而形成了它自己的文化。中国文化也吸收了灿烂的日本文化的因素，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文化成果。两国文化的交流，对于两国的历史发展意义极大。友好往来，互相学习，给双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巨大利益；反之，贪利忘义，掠夺侵略，使友好关系遭到破坏时，则给两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妄想逐步吞并中国，终至发动了侵华战争，最后已自食其果。利害昭然，瞻望二十一世纪，将更加如此。

如今中日关系已揭开了新的一页，而中日双方都还缺少内容新颖、雅俗共赏的关于中日文化交流的读物。为了继往

开来，我们诚挚地把这本小册子捧献给广大读者。只是本书篇幅有限，而中日文化交流的内容很多，我们只能选择一部分内容并尽量做到简明扼要，也没多写哲学思想的交流，因为哲学思想的抽象概念会使很多读者感觉艰涩。虽然，哲学思想的交流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这只要从孔、孟、老、庄、《孙子兵法》、鉴真在日本的巨大影响；朱子学在德川幕府初叶成为垄断思想领域的官学；从甲午战争结束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留日学生达五、六万人之多，研究了维新思想和日本移植的西方哲学，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便有明治维新的影响在其中；再有从哲学、主观、客观、演绎、归纳等词语都是自日语移植过来的等等情况来看，便不言而喻了。

本书的目的在于回顾和推进中日文化交流，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长廊添上一砖一瓦。我们切实注意了如下几点：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二、考核历史事实，务求言必有据；三、吸收中日双方最新的研究成果；四、诚挚友好的态度；五、文以载道，简练生动的语言。我们是努力这样做了，但限于水平，恐怕难免有不妥或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李 威 周

1986年春于山东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目 录

前 言

- 一、古老的传说…………… (1)
- 二、倭王金印与扶桑来使…………… (6)
- 三、大和时代的中国移民…………… (12)
- 四、入隋求学与大化改新…………… (18)
- 五、阿倍仲麻吕埋骨中华…………… (26)
- 六、鉴真东渡传戒律…………… (33)
- 七、遣唐使万里连帆…………… (42)
- 八、盛唐风采与天平文化…………… (54)
- 九、相扑、蹴鞠、围棋等的交流…………… (66)
- 十、频繁的贸易往来…………… (73)
- 十一、日本茶道的渊源…………… (81)
- 十二、日本花道的缘起…………… (87)
- 十三、东方艺术的瑰宝…………… (92)
- 十四、日本禅僧与汉文学…………… (100)
- 十五、从“宋元水墨”到“文人画派”…………… (108)
- 十六、柔道少林拳的结缘…………… (116)
- 十七、意气风发的留日学生…………… (120)
- 十八、两国盛开孙文莲…………… (128)

十九、鲁迅与日本友人·····	(134)
二十、走向二十一世纪·····	(142)

一、古老的传说

在距今大约四、五十万年前的远古时代，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是连在一起的，栖息在原始森林中的原脊象、熊、貉等哺乳动物，曾从中国华北平原成群结队地由陆路进入日本。在其后漫长的地质年代里，随着地层表面沧海桑田的巨变，日本逐渐与中国大陆分离，成为悬浮在大海之中的一群岛屿。

两国的先民隔海相望，在各自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创造着古代的文化。根据中日双方对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及人种血型等的最新研究，大概早在先秦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已开了端绪。公元前二百年，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日本也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从绳文文化发展到弥生文化时期。勤劳、勇敢的中日两国祖先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劳动生活经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丰富，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提高，大海不再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两国人民冲破大海的阻隔，展开了初期的交往。日本海的左回旋流，成了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条自然航道。早在《山海经·海内北经》中已有“倭属燕”的记载。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传说：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扫清六合统一中国后，“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真可谓踌躇满志，神采飞扬。为

了使自己能够永远坐在皇帝的宝座上，秦始皇迷信神仙方术之说，派遣一个名叫徐福的方士，率领五百童男童女到东海中的仙山上去寻求长生不老的神药。徐福登舟启程，一去数年未归，秦始皇朝思夜盼，几乎望穿双眼，当人们都以为徐福早已葬身海底时，他却又神话般地出现在秦始皇面前。他欺弄秦始皇说：蓬莱岛上的神药本来是可以得到的，无奈海面上时常有大鲛鱼出没骚扰，因而难以到达，他请求秦始皇派兵射杀大鲛扫清道路。日见衰老的秦始皇求药心切，对他的话深信不疑，立刻派遣童男童女三千人，携带大批粮食物资和弓弩，随徐福再次越海东渡。可是，秦始皇未能等到徐福归来，就死在出巡的途中。徐福也如同泥牛入海，从此杳无音信。

徐福后来怎样了呢？据说他漂洋过海，在日本群岛登陆，在今日佐贺县有徐福登陆处的石碑，在广岛县有徐福到达过的“严岛蓬莱”，他因未能求得神药，不敢回朝复命，遂带领众人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定居下来。他们开荒种地，从事农业生产，把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当时还处在渔猎阶段的日本，和岛国的居民和睦相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衍子孙后代，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去常有人据此说中日两国人民同文同种，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一、如从日本借用汉字创造了自己的表音符号“假名”并且袭用了大量汉字这一点而论，可谓同文，然而日本的语言与中国的并非一个语系，中国是孤立语的汉藏语系，而日本是粘着语的阿尔泰语系；二、即使徐福渡日的历史被证实之后，那也只能补充说明中国人是形成日本民族的一支血统的

事实，却非日本人与中国人完全是同种；三、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是黄种人，从这一点上说是同种；四、当代史学研究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即中日两国人民原来都是蒙古利亚人种，后来一支发展成中华民族，一支发展成日本民族，这一新观点如得到证实，那么追溯上古，中日两国人民确实可谓同种。同文同种的说法包含着两国人民的兄弟关系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曾被日本侵略者当作侵略的藉口利用过，所以使用时应该明白这些才好。

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中日两国的历史文献中都有许多记载，世代相传，历久不衰。明太祖朱元璋在接见来华的日本僧人绝海中津时，心里还牵挂着当年渡海未归、长留日本的中国同胞的下落。他关切地询问在日本是否真有徐福的寺堂，绝海中津当即赋诗作答：

熊野峰前徐福寺， 满山药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涛稳， 万里海风须早归。

朱元璋闻听大悦，欣然赐和：

熊野峰前血食寺， 松根琥珀也应肥。

当年徐福求神药， 直到如今更不归。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位中日交往的先驱者的怀念之情。诗中所述的熊野峰，就在今天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以东不远处一片层峦迭翠的山岗上。

在日本民间，也有许多关于徐福的传说。如说早晨踏露去参拜徐福墓，可以治愈一些疾病；又如说徐福把捕鲸和造纸的技术带到了日本，并传授给当地的日本人民，所以直到

现在，日本还出产一种“徐福纸”（如果徐福带去造纸技术这一点将来能得到证实，则可说明中国早在蔡伦造纸之前已发明了造纸技术）。还有，过去日本捕鲸船每年捕到第一条鲸鱼时，也要用来祭祀当年把射鲛（鲸）技术带到日本的徐福。

为了纪念这位传说中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日本人民在熊野峰修建了徐福墓，每年都有许多人从日本各地专程前往新宫，瞻仰祭祀，敬献鲜花和供品。在富士山地区也有祭祀徐福的神社，至今香火不断。清代驻日公使馆的黄遵宪和黎庶昌曾先后到熊野峰凭吊徐福墓，并留下了诗文。祭奠徐福的习俗一直保持至今，已经成为增进两国友谊的一项活动。1984年初夏，山东人民访日代表团还到徐福墓前献了鲜花。

关于徐福的故事流传至今，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两国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然而，是否确有徐福东渡的其人其事呢？这至今还吸引着许多学者孜孜探求。1982年，在江苏省赣榆县首次发现关于徐福的历史遗迹（徐福村），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徐福在琅邪（秦置，辖境在今山东半岛东南部）骗过始皇正相吻合，被认为是说明徐福东渡的有力佐证。^①近年来，卫挺生教授等在他们关于徐福的著述中，论定徐福就是日本历史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但是，也有许多学者对徐福的传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是出于虚构。如果徐福一行真的到了日本，那

^①连云港市徐福研究会编印了《徐福研究》，1985年已出两期，对徐福的考证和研究可望逐渐深入下去。

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前几年出海的，他们有否带过去许多书籍至今也还是个谜。总之，由于两千多年来历史迷雾的层层遮盖，虽然有很多文献记载，但内容简略，语焉不详，徐福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尚难下最后结论。徐福以前的中日来往更是如此。那么，中日文化交流的确切源头究竟在哪里呢？这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二、倭王金印与扶桑来使

大约在徐福东渡的同时，以绳文文化（也作绳纹文化，因该文化的代表性的陶器上有绳样简单花纹而得名）为标志的日本原始社会正经历着一次历史性的转折。金属工具和水稻耕作技术相继由中国大陆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北九州和近畿地区，如同巨大的杠杆有力地改变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摆脱了以渔猎采集为生，逐水草而居的原始生活，开始定居下来，从事农耕和畜牧，出现了众多的部落小国。这是日本原始社会文明发展的一次飞跃，由此开始进入了弥生式文化时代（弥生文化，以最早发现代表这种文化的陶器的地点——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而得名）。

近年来，日本考古学家在山阴、北陆等地区（日本本州北部沿海地区）发现大量属于弥生文化时期的铜铎，这种铜铎的造型与中国先秦的古钟极为相似，可以肯定，它的制作技术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此外，在日本博多湾沿海地带的弥生文化系统的墓葬中，还发掘出大量经考证是中国制造的古镜、铜剑等随葬品。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古代文物充分证明，早在公元前二、三百年，中国文化就传入了日本。

在造船和航海技术都还相当幼稚的时代，凭借原始的海上交通工具，横越万顷波涛，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近

代以来，有关专家对日本海流的大量调查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在日本海中，有一股沿日本群岛向左回旋流动的环流，利用这一强大的环流的推动力，朝鲜半岛的船只就可以比较容易地顺水漂浮，一直驶到日本的山阴、北陆等地海岸。本世纪初年，日本学者曾做过有趣的实验，把大批贴有标记的空瓶子抛入朝鲜半岛附近的水域，不久之后，有多半数的瓶子出现在日本西海岸，其中大部分漂达山阴沿岸。日俄战争时在海参威港外敷设的水雷，战后因俄国未清除，有三百多个浮到水面，漂到日本海岸的竟近二百个。了解到这一古老的自然航道的存在，中国文化在航海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能够经由朝鲜半岛远播日本，也就足以令人置信了。

弥生文化时期的日本，还没有出现文字，刻木结绳是人们用来记事的手段。反映这一时代日本社会状况及中日交往的文字资料，只能从中国的古文献中钩稽，有关资料散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历代典籍中。

目前所知，最早和较为可靠地记载日本社会状况的，是汉代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其中记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乐浪，即汉武帝吞并卫氏朝鲜后设立的治所乐浪郡，“倭”即当时中国对日本的称呼，这一名称一直延续到宋代。《汉书》中关于日本的记载虽然只有上述廿余字，但既概括了当时日本小国分立的社会状态，也记载了日本倭国使者来华的史实。

范曄所撰的《后汉书》，用约七百字的篇幅记述了日本的情况。中国的正史专门为日本立“传”，这还是第一次。其中也记载了东汉与倭国的交往：“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于印绶。”现代历史学家认为，文中所称倭奴国，就是日本北九州沿岸一带的部落小国。

作为揭示几千年前历史真象的佐证，从地下发掘出的实物往往比文字更具有说服力。1784年，一次偶然的发现引起日本史学界和考古界的极大兴趣。在日本博多湾志贺岛（现在的福冈市东区），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在农田的水沟中，发现了一枚闪闪发光的金质印章，上面有用阴文篆体刻写的“汉委奴国王”五个字。这枚金印的形制、字体、雕刻工艺以及上面缀有蛇形纽等特征，与从中国汉墓中出土的金印如出一辙。经学者们考证，“委”即“倭”，这枚金印就是当年汉光武帝授与倭奴国王的。金印之谜的揭示与《后汉书》的记载完全吻合，两者互相印证，从而肯定了汉光武帝曾向日本倭奴国王授于印绶这一历史事实。

金印作为日本的国宝，陈列在福冈市美术馆一个特制的玻璃柜中。日本政府还在发现金印的地方特别开辟了一个公园，取名金印之园，入口处矗立一座巨碑，上刻“汉委奴国王金印发现之处”十一个隶字，公园内雕塑着硕大的金印印文的模型，并有郭沫若1955年访问福冈时题诗的纪念碑。福冈市还把纯金的金印复制品赠送给中国作纪念。

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大约在汉武帝授给倭王金